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6, 13(7), 727-734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7515

Hans汉斯

不同老年群体视角下的数字风险及其治理路径研究

王明珠，樊嘉琦

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3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31日

摘　要

在老龄化与数字化背景下，老年群体成为数字风险高发人群。既有研究忽视其异质性，治理缺乏精准性。文章基于异质性视角，以“年龄－职业－工作状态”模型将老年群体分为“融入型”、“过渡型”、“边缘型”三类。三类群体分别面临高阶投资陷阱、技术伪装诈骗、基础信息泄露等风险，成因涵盖个体、技术、家庭及AI滥用等因素。研究揭示其风险应对行为差异，并构建“社会－社区－家庭－老年群体”四维协同治理框架，推动从“被动防御”向“精准治理”与“主动赋能”转型，为构建全龄包容的数字社会提供路径。

关键词

数字素养，脆弱性，数字包容性，数字风险治理

Research on Digital Risks and Their Governance Path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 Elderly

Mingzhu Wang, Jiaqi Fa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April 21, 2026; accepted: July 23, 2026; published: July 31, 2026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and digitalizatio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high-risk group for digital risks. Existing research has overlooked their heterogeneity, resulting in governance lacking precision. This article adopts a heterogeneity perspective and categorizes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to

文章引用: 王明珠, 樊嘉琦. 不同老年群体视角下的数字风险及其治理路径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7): 727-734. DOI: 10.12677/ar.2026.137515

three types “integrated,” “transitional,” and “marginal” using the “age-occupation-work status” model. These three groups face distinct risks, including high-end investment traps, technical disguise fraud, and basic information leaks, with causes spanning individual, technological, familial, and AI abuse factors. The study reveals differences in risk response behaviors and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encompassing “society-community-family-elderly population.” This framework promotes a shift from “passive defense” to “precision governance” and “active empowerment,” providing a pathway to build a digitally inclusive society for all age groups.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Vulnerability, Digital Inclusion, Digital Risk Governance

1. 文献评述与问题提出

截至 2025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2,338 万人，占总人口的 23%；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2,365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9%[1]。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风险日益加剧，使其成为数字诈骗的高危潜在对象。从社会学视角看，老年人数字风险的严峻性本质上是社会结构不平等与技术变迁交互作用的产物。这一风险不仅关乎个体的技术适应能力，更折射出代际权力、资源分配、制度设计等深层社会矛盾。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度渗透与老龄化社会的加速演进，老年群体在尝试融入数字生活时，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风险与挑战。老年人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等数字风险的主要受害群体。从社会学视角审视，这一现象远非个体技术适应能力的不足，其在本质上是社会结构不平等与技术变迁相互交织的产物，深刻反映了数字时代的代际权力失衡、资源分配不公与制度设计缺陷等深层社会矛盾。因此，系统剖析老年群体数字风险的异质性及其成因，对于推动数字包容、构建全龄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社会脆弱性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个人或群体在面对外部冲击(如数字风险)时的脆弱性，由三重维度决定：1) 暴露度：接触风险的概率与频率；2) 敏感性：因个体固有特征(如年龄、健康状况、数字素养)而受到负面影响的强度；3) 适应能力：调动内外部资源(如认知技能、家庭支持、社区服务)预防、应对并从风险中恢复的能力。数字风险本质上是数字化这一“技术–社会”冲击下，老年群体内部结构性差异导致脆弱性异质性的体现。下文将运用此框架，系统分析三类老年群体在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三个维度上的差异，进而解释其风险表现与应对行为的区别。

学界围绕老年数字风险已展开初步探讨，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风险类型划分上，学者们通常将其归纳为治理风险、物质性风险与非物质性风险。匡亚林等(2023)指出，治理风险表现为农村老年人在数字化治理中政治表达权的虚化与信息传递梗阻；物质性风险体现为经济压力与设备适配难题；而非物质性风险则涵盖了因技术使用不当引发的身心健康与社会适应问题[1]。2) 在群体特征识别上，研究多依据数字素养进行单一维度的类型学划分。例如，顾磊等(2024)将老年人划分为“熟练型”、“基础型”与“边缘型”，并细致描述了其年龄分布与行为特征，如“边缘型

[1]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老年人”因“怕弄坏”设备而产生显著的排斥心理[2]。这类研究为理解老年群体的内部差异性提供了有益视角。3) 在治理路径演进上，宋月萍等(2024)指出，数字社会治理先后经历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银发产业数字化”与“关注老年人数字障碍”三个阶段，但其演进过程仍存在明显短板，如忽视了老年人数字技能的培育，且未能充分尊重并激发老年人的自主性[3]，导致治理效能未能完全释放。

综上所述，尽管现有研究对老年数字风险的类型与宏观诱因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仍有一定局限：已有研究多从整体角度考虑老年群体，较少对其内部不同类型子群体进行精细化剖析，致使风险画像模糊，应对策略靶向性不足；在风险成因分析方面，多从个体能力或单因素层面考虑，缺乏对多维因素的考虑。因此，文章从老年群体的异质性角度出发来分析相应的数字风险特征，并从技术设计、家庭支持与社会制度等多维因素来分析相应的影响机制。旨在系统回答以下核心问题：不同类型的老年群体分别面临何种特征的数字风险？其背后的形成机理如何？进而，如何构建一个与之匹配的、能够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赋能”的协同治理框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研究期望为理解老年数字脆弱性提供新的理论透镜，并为精准化的政策设计与实践干预提供路径支持。

本研究旨在通过理论建构提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类模型(“年龄－职业－工作状态”三维模型)与分析框架。为初步验证该模型的有效性与类型描述的合理性，下文将系统性地引用权威二手数据，并结合文献中已发表的典型案例进行交叉佐证。本文提出的三类群体画像与风险判断，构成了可供后续实证研究检验的系列假设。

2. 不同老年群体的数字风险类型与表现差异分析

研究基于老年分层理论、数字不平等理论与风险感知理论，以“年龄－职业－工作状态”为三维交叉分类依据，结合资源禀赋与心理认知双重逻辑，将老年数字风险群体划分为“融入型”、“过渡型”、“边缘型”三个典型类别，共同构成从深度融入到完全边缘的连续谱系。

融入型典型画像为 50~60 岁的未退休教职工、工程师等低龄老人，多有技术或管理类职业背景，部分仍在灵活就业，数字技能扎实且能熟练使用各类 APP，深度融入数字生活。过渡型典型画像为 60~70 岁的退休工人等中龄老人，多从事过普通文职或服务类工作，已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仅掌握发微信、刷短视频等零散基础数字操作，能力不稳定。多从事过普通文职或服务类工作，仅掌握零散的基础数字操作，风险感知模糊且应对行为被动；边缘型典型画像为 70 岁以上的农村独居老人，多有体力劳动经历或无稳定工作，基本不会使用智能设备，存在明显数字排斥，日常依赖线下服务和现金交易。

研究并非追求穷尽所有个体，而是为了揭示最具解释力的模式。这三类群体是基于“资源－认知”双重逻辑和三维交叉模型推导出的“理想类型”。“融入型”和“边缘型”构成了数字融入的两个极端，“过渡型”代表了最大、最不稳定的中间过渡带。分析这三类相应群体，能够有效把握整个现象的主要结构、动态和矛盾。每一类都清晰对应着资源与认知的某种典型组合，使得理论逻辑一目了然。

2.1. 不同老年群体所面临的数字风险类型差异

对于“融入型”老年群体而言，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主要体现在高阶衍生型风险与精准定向诈骗等方面。老年群体的核心融入障碍并非操作技能缺失，而是数字风险预判机制与信任边界认知的双重短板，使其在复杂金融、社交场景中易成为精准化、隐蔽性诈骗的靶向对象[4]。从社会脆弱性视角看，该群体的“暴露度”主要来自复杂金融场景与深度数据化生存；其“敏感性”并非源于能力缺失，而是源于对自身判断力的“过度自信”这一认知特征；而其适应能力本应很强，却被不友好的技术环境(如界面频繁更新、协议冗长)所系统性削弱，导致“功能自锁”与“授权疲劳”。该群体通常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与学习能力，并具有对资产进行保值增值的意愿，而诈骗分子正是利用这一心理，精心设计出界面专业、

逻辑复杂的虚假投资平台，例如打着“数字养老投资”、“数字藏品”等新兴概念的骗局，从而实施极具针对性的诈骗。此外，技术环境本身也构成了其独特的风险源：由于应用程序界面频繁更新、功能菜单层级过深，他们可能无法及时定位并关闭已授权的“自动扣款”或“连续包月”服务，这种因设计不友好导致的“功能自锁”现象，造成了其在非主观意愿下的持续性财产损失。即便该群体拥有较高的隐私敏感度，在面对冗长复杂的用户协议与隐蔽的授权选项时，也不免因“授权疲劳”而选择性忽略细节，最终在不知情下授予了过多权限，引发技术性隐私泄露。

“边缘型”老年群体，其面临风险格局根植于多重脆弱性的叠加，主要表现为基础生存型风险与情感操控型风险。该群体是社会脆弱性的极端体现：高“暴露度”(易成为诈骗目标)、高“敏感性”(健康焦虑、认知衰退、数字恐惧)、低“适应能力”(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完全依赖代理人)。三重劣势叠加，使其陷入受保护的非自主状态。他们最易遭受“冒充公检法”或“AI 换脸冒充子女紧急求助”等直接电信诈骗，这类骗术直接利用了人性中对权威的敬

“过渡型”老年人，他们的风险图谱呈现出显著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因而成为风险防范与干预体系中的“关键变量”。该群体的社会脆弱性呈现动态特征。其“暴露度”中等，多发生于生活缴费、社交转发等日常场景；较高“敏感性”源于其碎片化、不稳固的数字知识体系；适应能力高度情境依赖，导致其在风险应对中表现出情境摇摆。老年群体的融入障碍核心在于数字产品设计与自身需求的错位，以及社会支持的碎片化，使其既难以应对技术伪装性骗局，又易因操作生疏引发日常使用风险[5]。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具有典型的混合性与情境依赖性。具体而言，他们虽具备基础操作能力，但难以应对精心伪装的骗局，因此易受钓鱼链接、仿冒 APP 以及诱导授权(或称“软诈骗”)等具有一定技术伪装性的侵害。在实践层面，因相应操作技能生疏，他们在进行线上缴费、挂号等日常操作时，可能因失误导致交易失败、重复支付或信息错填。此外，其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依然有限，对谣言与虚假新闻的批判性存疑，这不仅使其可能成为错误信息的受害者，更可能在无意中成为其二次传播的节点。

2.2. 不同老年群体应对风险的表现差异

“融入型”数字群体在数字风险应对中呈现显著的自主防御行为范式：遭遇可疑情境时，其主动依托官方渠道核验投诉，依托网络资源迭代反诈认知框架，展现出高度的行动主动性与策略性。但该群体对自身判断力的高确信度易形成固化认知定势，系统性低估 AI 深度伪造等新型技术诈骗的迷惑性。其底层行为逻辑体现为，该群体惯于依托既有知识体系完成风险研判，当诈骗场景精准靶向其“信息优势自信”“理性决策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叠加高仿真技术外壳的加持时，原有认知防御体系将出现结构性盲区，最终在看似完全理性的分析路径下催生非理性决策。

“边缘型”群体的应对行为则表现为典型的“被动依赖型”。由于数字能力的根本性缺失与健康脆弱性的叠加，他们的风险应对几乎完全依赖子女、亲友或社区工作者等“数字代理人”。这种依赖关系固然提供了基础保护，但同时也潜藏着二次风险：一方面，代理人的偶尔缺席或失误可能使其直接暴露于风险之中；另一方面，账户共享、密码代管等行为本身也构成了新的信息泄露渠道。从本质上看，该群体的行为表现是社会脆弱性理论中“资源占有不足”、“生理机能衰退”与“社会支持网络脆弱”三重劣势在数字场域中的集中体现，其结果是将自身置于一种“受保护的非自主”状态，数字可行能力被严重剥夺。

“过渡型”群体他们的应对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情境摇摆型”特征。其风险应对效能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的触发线索与即时情绪反馈。一次成功的数字体验，例如独立完成一次复杂的线上交易，能够显著提升其自我效能感，激励其采取更积极的探索行为，其行为模式向深度融入群体靠拢。反之，一次哪怕轻微的“软诈骗”经历或操作挫折，也极易引发强烈的挫败感与不信任，导致其迅速退守至规避使用

的保守策略。这种不稳定性表明群体的数字素养体系尚未内化为稳固的认知模式，其行为决策更易受外部环境与短期情绪波动的支配，使其成为风险防范中最为不确定、也最具可塑性的“关键中间群体”。

3. 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维模型的异质性风险溯源

老年群体数字风险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个体内在条件与外部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基于“年龄–职业–工作状态”三维模型，不同类型的老年群体在风险成因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背后是特定的驱动机制与结构性矛盾导致。

3.1. 融入型群体：技术性排斥与认知陷阱的双重困局

该群体的风险根源主要不在于能力的绝对缺失，而在于其既有能力被不友好的技术环境所削弱，并受到针对其心理特征的精准利用。首先，技术设计的系统性偏差是构成其风险暴露的核心外部因素。当前数字产品的交互逻辑、界面设计与更新频率，普遍以年轻、熟练用户为预设模型。复杂的隐私设置层级、冗长且充斥专业术语的用户协议，以及频繁的界面迭代，即便对于高素养老年人也构成了显著的认知负荷。这种设计上的不包容，在事实上剥夺了其有效行使知情同意权与控制权的能力，导致其在面对精心伪装的诈骗界面时，因“功能自锁”或信息误导而做出误判。

其次，“授权疲劳”与决策倦怠是其风险形成的内在心理因素。老年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需以法治为基石，当前数字权利界定模糊、救济机制不完善的现状，加剧了技术应用与权利保护的结构性失衡，使高素养老年群体也面临技术性隐私泄露的制度性风险[6]。最后，针对“精英”的认知陷阱是其受骗的重要诱因。诈骗分子深入研究其心理，利用其具备金融知识、追求资产增值且自信于理性判断的特点，设计逻辑复杂、界面专业的虚假投资平台。

3.2. 边缘型群体：多重脆弱性与支持网络断裂的叠加效应

该群体是数字风险中最脆弱的环节，其困境源于内在能力与外部需求的根本性断裂，以及支持系统的失效。内在三重脆弱性的叠加是风险汇集的基础。数字素养较弱使其缺乏操作设备与识别风险信号的基本能力；多病的身体状况不仅使其认知机能进一步衰退，更迫使其频繁使用在线医疗应用，持续产生高价值的敏感健康数据，从而成为数据窃取与精准诈骗的“高价值目标”，使其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对潜在风险缺乏基本警觉。这三者相互强化，共同剥夺了其数字安全的“可行能力”。

家庭与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或低效则加剧了其风险暴露。数字失能老年群体的风险加剧源于技术指导缺位与情感支持断裂的双重作用，其信息闭塞与孤独感使其成为网络诈骗、算法操纵的高危靶向群体，农村地区该特征尤为突出[7]。子女或因代际数字鸿沟无法提供有效指导，或因远程照料而普遍采用“代操作”模式，这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使用问题，却带来了账户共享、密码泄露等二次风险，并进一步削弱了其本就匮乏的自主学习和实践机会。社区等外部支持力量的缺位或服务可及性不足，使其在面临风险时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干预与帮助。

3.3. 过渡型群体：能力结构不稳与情境依赖下的行为摇摆

该群体的风险成因最具动态性，其核心在于自身能力结构的不稳定与对外部情境的高度依赖。数字素养体系的不稳固是其风险不确定性的内在根源。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使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无法稳定地迁移和应用。

情境线索与情绪反馈的支配性影响是其行为摇摆的关键机制。一次成功的数字体验所带来的正向反馈，能显著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促使其向更积极的数字参与迈进；反之，一次轻微的受挫经历(如被诱导

授权、遭遇操作困难)所引发的挫败感与不信任，则可能迅速导致其产生数字退缩行为。他们的风险决策因此更易受短期情绪和即时环境的影响，而非基于理性的长期判断。

3.4. 宏观归因：技术加速迭代与制度保障滞后的结构性张力

尽管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但所有老年群体共同面临着由宏观技术与社会环境塑造的共性挑战。这主要包括：快速迭代的技术变迁对所有群体的适应能力构成持续压力；商业平台基于追求用户粘性的算法逻辑与产品设计，共同营造了高风险的数字环境；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与执行效能，构成了数字安全风险的底线保障；老年群体数字风险的共性诱因根植于数字产品适老化缺陷、服务供给失衡与个体数字认知局限的三重耦合，这种耦合效应突破群体边界，形成覆盖广泛的系统性风险环境[8]。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与执行效能，构成了数字安全风险的底线保障；以及全社会数字包容文化与伦理意识的培育水平，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风险感知与行为规范。这些共性因素构成了老年数字风险滋生的共同土壤。

4. 治理路径：老年人数字风险的防范策略

结合不同老年群体数字风险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数字风险的形成是技术设计、制度保障、家庭支持、社区服务与个体能力等多维度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且不同类型老年群体的风险诱因、脆弱点存在显著差异，单一主体或分散措施难以实现精准防控，结合不同老年群体数字风险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文章通过构建“社会–社区–家庭–老年群体”四维协同框架，探索老年人数字风险的防范路径。该路径既强调社会层面的制度设计与技术基座构建，也注重老年群体自身的能力提升与认知校准；既依赖家庭代际间的动态支持与情感联结，也依托社区场域的场景化演练与资源整合。通过四维主体的功能互补与联动，旨在将分散的防护措施整合为韧性的治理网络，最终实现从“风险防御”到“安全赋能”的转变，致力于保障老年群体在数字社会中的权利实现与生活福祉，确保其在技术接入、使用与受益全过程中的自主性、安全性与尊严。

4.1. 政府维度：构建韧性制度与数字基础设施

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与资源统筹的核心主体，需在保障全体老年人数字权益的基础上，针对三类群体的风险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形成“基础兜底 + 精准突破”的治理格局。

为构建“基础兜底 + 精准突破”的治理格局，政府需在保障全体老年人数字权益基础上，针对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策略：对“融入型”群体，重点推行高风险交易动态监管并建立“银龄数字智库”以防范高阶风险；对“过渡型”群体，着力开发分层式适老操作系统并开展数字能力巩固计划以提升使用稳定性；对“边缘型”群体，则通过建立一对一数字监护人配对机制和提供极简版民生服务工具，确保其基本生活不受数字排斥影响。这一路径既强调普惠性基础设施与制度保障，也注重针对不同风险特征的精准干预。然而，上述制度设计与技术基建的有效落地，仍需直面一系列现实挑战，并明确相应的资源需求与责任主体。

4.2. 社区场域支撑：从“课程供给”到“风险情境实验室”

社区作为老年群体日常活动的核心场域，需结合三类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设计差异化的场景化干预方案，实现“风险演练–即时帮扶–长期互助”的闭环。

建立“社区数字助老服务站”[9]，配备专业的数字辅导员，提供免费的设备调试、APP 安装指导、诈骗证据留存(如截图、录音保存)等服务，每周设置“数字义诊日”，集中解决老年人使用中的疑难问题；

开展“全民反诈邻里行动”，每月组织一次反诈宣传活动(如讲座、话剧表演)，邀请民警、银行工作人员解读最新骗局案例；在社区公告栏、电梯间张贴“风险提示海报”，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标注“仿冒 APP 识别要点”“诈骗电话特征”。

面向异质性老年数字群体精准施策：“融入型”群体推 VR 反诈实训转志愿传播，“过渡型”群体以情境工坊 + 朋辈互助强化实操，“边缘型”群体上门兜底操作安全并配套数据防护。社区落地存三重约束：辅导员缺编缺经费流失率高、老人参与波动效果难续、农村覆盖成本高。依托多元经费、标准化反诈工具箱、志愿积分机制，联动街社、警企、校银多主体，以“微基金”造血 +“认证督导”队伍建设实现长效运营。

4.3. 家庭代际协同：从“一次性灌输”到“动态陪伴”

家庭作为老年群体最信任的支持单元，需根据三类群体的自主意愿与能力水平，构建差异化的代际互动模式，在尊重自主性的前提下降低风险。制定“家庭数字公约”，明确家庭成员间的数字支持责任(如子女每周需提供 1 次设备检查服务)、高风险操作的沟通规则(如转账金额超过 1000 元需提前告知子女)，并约定“数字使用边界”(如不强迫老年人学习复杂功能)；数字反哺对于老年数字融入的作用具有“有限性”，甚至可能因文化差异和子女支持的“非专业性”而再生产并巩固数字代沟。这一观点警示我们，需审慎看待代际支持的质量与效果[10]。

推广“亲情守护工具”，在老年人手机中安装“家庭安全助手”APP，支持子女远程查看老年人的账户交易动态(需本人授权)，对异常交易(如深夜转账、陌生账户收款)实时提醒，同时可远程协助解决简单的操作问题(如清理手机内存)。

家庭支持按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层级分类精准干预：“融入型”群体以平等代际研讨协同迭代风险认知，“过渡型”群体以阶梯赋权 + 家庭互动场景强化技能自信，“边缘型”群体以代操作留痕 + 情感化沟通完成从代劳到知情的转型，家庭支持长效性仍存结构性约束。落地挑战包括代际分居导致子女精力不足、过度监护易损伤老人自尊、代际数字约定无强制力。依托家庭安全助手运维、代际沟通指导内容、子女反哺培训三类资源，联动家庭、社区家教中心、中小学、数字责任监护人多主体，以推广自愿签署的代际数字契约、“时间银行”志愿代服务模式补位落地。

4.4. 个体维度：老年人数字适应力的内生培育与认知重塑

老年群体的自我赋能是风险防范的根本，需根据三类群体的认知基础与行为特征，设计“分层、精准”的能力提升方案，推动其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应对”。

个体维度按三类老年群体特征差异化赋能：“融入型”主动驾驭高阶风险，以知识更新、家庭安全员履职、社会反馈实现经验价值转化；“过渡型”聚焦核心生活场景技能，通过场景化练习、求助清单、每日小任务稳能力消焦虑；“边缘型”以安全为底线，依托紧急联系功能、拒险本能、旁观学习，在一对一帮扶与极简设备支撑下搭建基础数字连接，推动全体老人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建构数字生活。

5. 总结

基于突破传统单视角的局限性，构建“年龄－职业－工作状态”三维分类模型，将老年群体划分为“融入型”“过渡型”“边缘型”三类，系统厘清其差异化数字风险特征与生成机理，证实老年数字风险是个体能力、技术设计、家庭支持、社会环境多因素耦合的结果。研究从认同伦理视角揭示，老年人数字身份受技术、社会、心理多重因素叠加呈现“遮蔽”状态，其本质是适配不足、认同缺失、自我效能弱化的共同作用，需依托技术关怀、他者认同、个体赋能形成合力完成“解蔽”，为凸显老年群体主

体性提供理论支撑。基于此提出以“精准识别、分层应对、系统治理”为核心的治理路径，对深度融入群体侧重技术包容与前置预警，对部分融入群体强化能力巩固与正向激励，对数字排斥群体搭建全维度支持网络，最终形成覆盖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的四维协同治理框架[11]。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缺乏一手实证数据的直接检验。作为一项理论先行研究，我们构建的“融入型–过渡型–边缘型”分类模型及其风险特征描述，尚需通过小范围深度访谈(每类群体选取 3~5 名典型个案)或设计量表进行大样本问卷验证。未来研究可基于此分类，开发“老年数字风险易感性量表”，并检验不同干预措施对三类群体的差异化效果。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风险分析的单一维度，提出了更具解释力的分类模型与分析框架；实践意义则体现在为差异化政策制定、适老化产品设计以及社区精准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最终，通过制度保障、主体赋能、代际协同与场域再造的多维联动，推动构建一个真正包容、安全、有尊严的全龄友好数字社会。研究提出的协同治理框架的实效性，仍需在具体的政策与实践场景中进一步评估与优化。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42301314)。

2023 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L-2023-2704)。

参考文献

[1] 匡亚林, 蒋子恒. 迈向数字包容: 农村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衍生风险及治理[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7(6): 100-108.

[2] 顾磊, 徐生菊. 老年群体数字素养调查与分析——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J]. 文献与数据学报, 2024, 6(1): 92-105.

[3] 宋月萍, 彭可余. 面向老龄化的数字社会治理: 现实、演变与未来进路[J]. 江西社会科学, 2024, 44(5): 118-128.

[4] 敬婷. 老年人群体融入数字社会的障碍因素研究[J]. 国际公关, 2024(20): 50-52.

[5] 汪斌. 数字红利视角下老年数字失能表现、成因及治理新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2): 60-67.

[6] 王文娜. 老年数字弱势群体数字权利的法治保障[J]. 现代商贸工业, 2024, 45(22): 188-190.

[7] 刘卫巧. 农村老年人数字失能问题及应对策略[J]. 农村·农业·农民, 2023(24): 37-39.

[8] 程鹏飞. 我国老年人数字贫困问题影响因素及治理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3.

[9] 张晓雯. 我国老年社区脆弱性指标体系构建及影响因素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4.

[10] 陈宇恒. 数字反哺能否弥合数字代沟?——数字反哺的有限性与数字代沟的再生产[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5, 32(8): 64-77, 127.

[11] 尤吾兵. 认同伦理视角下老年人数字身份的“遮蔽”与“解蔽” [J]. 中州学刊, 2024(10): 98-106.